

汉语在近代欧洲的传播

于培文

(北京语言大学 培训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汉语在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欧洲汉学发展关系密切。首先概述了欧洲汉学的发展轨迹;继而论述了近代欧洲汉语学者群体、汉语教学方法以及汉语传播场所,爬梳了近代欧洲汉语学习者所使用的汉语教材情况,综述了近代欧洲汉语教材编写发展情况以及汉语字典的编纂情况;最后指出,汉语在近代欧洲的传播是依托欧洲汉学的发展进行的,汉语对近代欧洲的传播阵地在不同时代场所有所不同,汉语在欧洲的传播范围和传播规模越来越大,欧洲汉学的研究与发展为汉语西传注入了持久的生命力,反过来,汉语教学的蓬勃发展又推动着欧洲汉学的进一步发展,二者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关系会愈加密切。

关键词:汉语传播;近代欧洲汉学;汉语学习者;汉语教学方法;汉语教材及词典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7)03-0022-06

DOI: 10.3969/j.issn.1005-6378.2017.03.004

汉语是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载体和媒介,海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研究,首先是从接触、了解、学习、研究汉语开始的。公元1500年左右,欧洲人完成的世界地理大发现开启了欧洲近代史的序幕,自此以后,欧洲人走向海外,开始了殖民统治浪潮。欧洲宗教界在16世纪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成立了一些新的教会组织,这些教会组织鼓励传教士走出欧洲,到“未开化”的异教徒之地传播基督的福音。欧洲人正是在世界殖民统治浪潮和去异教之地传教这两大世界性事件的历史背景下开始了与汉语的初步接触。

一、近代欧洲的汉学发展

汉语在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欧洲汉学的发展关系密切,欧洲汉学的发展与欧洲的世界殖民浪潮和宗教传教活动关系紧密。欧洲汉学以法国为基地,是对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经典的研究,侧重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研究,是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过程中与世界其他文化碰撞交流之后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欧洲汉学的发生、发展与世界政治、经济、交通的发展分不开,其发展历史通常分为四个阶段:“游记汉学(早期一鳞半爪的游记内容)”、“传教士汉学(传教士严肃的汉学探索)”、“专业汉学”(专业汉学家的系统研究)和“现代汉学”时期^[1347](传统汉学和中国学并行发展、相互交融的研究)。汉语对欧传播在这几个阶段的特点表现为:(1)16世纪80年代之前的“游记汉学”阶段的汉语传播主体为西方商人、外交使节、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文化人,他们的游记、日记、札记、通信、报告中,零星可见关于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描述,这个时期的汉语西传处于萌芽期,汉语学习是零星的。(2)16世纪80年代之后的“传教士汉学”时期,传教士来到澳门或南洋或中国本土,汉语教学活动开展,有的传教士已经熟练掌握汉语。(3)“专业汉学”阶段指的是汉学课程走进欧洲大学,取得独立学科的地位,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汉学家队伍开始形成,形成标志是1814年11月11日法兰西学院创设“汉语和鞑靼—满语语言文学”讲座,1815年1月16日“汉学讲座”启动,这是西方第一个汉语教学科研机构,也是中国语言文学首次进入西方大学的神圣殿堂。这个时期的汉语教学与研究活动已经开展,一些

收稿日期:2016-10-15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研究”(13JZD032);北京语言大学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17YJ090004)

作者简介:于培文(1969—),女,江苏人,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跨文化研究、第二语言教学法研究。

大学设置了汉语教席,汉语学习者已经具有一定数量,汉语教学方法基本采用语法翻译法,汉语教材编写与词典编纂具有一定的规模,汉语本体研究(语音、语法、词汇)的帷幕已经开启,汉语研究者分为两大阵营,一支是欧洲大学的专业汉学教授,另一支是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工作人员,后者有的后来成为汉学家。(4)“现代汉学”主要指中国学的发展和研究,中国学于19世纪后期在美国兴起,以实用为原则,侧重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是区域研究的肇始,中国学总的来说对中国社会问题持“批评”态度^{[2]145-147}。欧洲“现代汉学”融合了“汉学”和“中国学”的研究,研究主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呈现出接近和兼容的趋势^{[3]34}。与此相适应,越来越多的欧洲大学开设了汉语言文化专业,专业教师队伍不断扩大,学生人数越来越多,对汉语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厚,研究领域逐渐扩大。欧洲汉学的蓬勃发展,绕不开汉学研究者的汉语学习及研究,本研究将从近代欧洲的汉语学习者、汉语教学方法、汉语教材编写、中欧汉语词典编纂等方面,来梳理近代欧洲汉学发展背景下的汉语对欧传播概况。

二、近代欧洲的汉语学习者

欧洲人与中国进行面对面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始于16世纪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葡、西、意等国的传教士们开启了欧洲了解中国的大门,之后,其他欧洲国家陆续派出传教士来华,来华传教士是欧洲殖民活动的先行者。来华传教士及其随行的家人,专业汉学家,来华外交官、商人、旅行家及探险家是欧洲最早的汉语学习群体。他们学习汉语的地点和师资并不一样:有的在欧洲本土的汉学机构学习汉语,教师一般是机构的汉学教授,有少数人的教师是在欧洲旅居的中国人;有的在中国学习汉语,如利玛窦;有的先在自己国家学习,然后到传教目的地继续学习,如理雅各;还有的是在别的亚洲国家依靠学习,例如,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士曼是在印度学的汉语,他学习中文的途径为:一是拉萨尔老师,他是出生在澳门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二是拉萨尔的两个中国仆人;三是靠一部拉丁语—汉语词典^{[4]58}。明朝时期的欧洲传教士来华后,为了保证传教活动和为殖民服务的使命的顺利完成,他们跟汉语有一定基础的传教士或中国塾师学习古汉语,诵读《四书》《五经》和古典文献,学习明王朝通行的官话。1578年,耶稣会远东观察员范礼安来华,成为第一批到达澳门的耶稣会士,确立了“中国化”的传教路线,即熟悉并能熟练使用中国话才是耶稣会士在华生存与发展的通行证^{[5]22}。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分别于1579年6月和1582年8月到达澳门,他们遵循着范礼安的传教路线,跟完全不懂西语的中国人学习汉语。利玛窦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注意到汉语与欧洲语言差异极大,认为汉语的四声和同音字词是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一个大障碍,他在1606年8月15日的信中写道:“这种语言与希腊语、德语都不同。这一语言中有许多词汇具有许多含义,非常容易产生误会。有时,四种不同的发音声调,意思就完全不同。所以,他们之间在讲话时,为了能够明白对方的意思,有时候得把要说的写下来;而且每个字也都是不同的。……这种语言有许多字、词汇或者其他东西,多达七万以上。而且全部都迥然不同,容易使人上当受骗。”^{[6]6}利玛窦的这封信中也提到了当时的汉语总词汇量在7万以上。

三、近代欧洲的汉语教学方法

近代欧洲人采用什么模式学习汉语呢?是注重“语”,还是注重“文”?还是“语”“文”并进?传教士一般采用的是“语”“文”并进的学习模式,这是由他们的身份和使命决定的,因为掌握流利的口语和书面语,有利于他们对中国知识的有第一手的了解。传教士们需要用汉语在中国传教,必须学习“语”,他们以自己的汉语口语能力为傲,同时,他们也需要学习汉语书面语,熟悉中国经典,了解中国人的思想根源,需要从中国典籍中找出中国思想与基督教之间的关联。其他欧洲汉语学习者一般则侧重“文”的学习,即注重汉语书面语的学习。随着中西商贸、文化、外交、军事往来的不断深入,欧洲人学习汉语的热情日渐高涨,传教士汉学阶段,欧美的职业汉学研究者仍然注重“文”的学习,多数人很难驾驭中文口语。欧洲人主要采取聘请中文家庭教师学习汉语,继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置汉学课程后,西方各国高等学府纷纷设置汉学系或开设汉语课程,一些汉语学习者进入这些高等学府学习汉语。18世纪30年代意大利拿波里创办了中国学院(Collegio dei Cinesi),开设汉语教学课程,英国1837年、俄国1851年、荷兰1875年、美国1876年、德国1912年相继在大学或研究机构首开汉语教学课程,这些机构无一例外地沿袭着自利玛窦

以来的“以译经学汉语”的传统^{[7]158},即用语法翻译法教授汉语书面语(仅有极少数的机构教授汉语口语),语法翻译法一直在西方人中延续使用。例如,19世纪英国的马礼逊、柯大卫、理雅各等都利用此法学习汉语。以德国为例,德国传统汉学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但不注重汉语口语的学习,很多汉学家认为汉语口语不重要,他们不会说汉语,慕尼黑大学的汉学传统即是一例;汉堡大学的汉学系情况有所不同,它要求学生接受汉语口语培训,原因是汉堡建立汉学专业是因为汉堡的商人跟中国有长期的商贸往来,他们要求大学做这种培训^{[8]140}。比利时的汉语教学也颇有特点,比利时汉学研究和汉语教学的不断推进得益于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大力支持,1898年,他在给鲁汶大学校长的亲笔信中写道:“中国很重要,学习汉语非常重要”^{[9]29}。1926年,比利时根特大学设立“中国考古与艺术课程”教席,正式启动汉学研究和汉语教学。1937年,根特大学开设了“古代汉语”课程,汉学教学与研究更为专业、更为系统,后来,根特大学成立了汉学系,主要从事中国语言、文化、宗教和历史等领域的教学与科研活动,招收汉学专业本硕博学位的学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在教学方法上,这两所高校都比较传统,强调“语”“文”并进。进入现代汉学阶段,中欧交流越来越频繁,欧洲大学的汉语教学越来越重视采用“语”“文”并进的模式进行教学,以适应国家培养汉语文化交流人才的需要。

除了在欧洲本土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汉语教学外,在亚洲及中国的很多地方也开展了对外汉语教学。澳门是欧洲来华传教士的第一个据点,澳门自1557年以来,设有葡萄牙人居住地,1565年设立了耶稣学院及教堂,首批来华传教士以澳门为中西语言比较的第一个“实验室”,开始在此学习汉语,澳门耶稣学院因此成为远东第一所东方语言学校,成为西方神学、哲学和科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在华传播的第一个中心^{[10]19}。由马礼逊提议筹建的马六甲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于1818年建立,基德、柯大卫、理雅各都曾在此任教。学院的短期目标之一就是培养欧籍学生运用汉语语言的能力,书院聘任掌握汉语基本知识的欧籍基督徒出任教授一职,向欧籍学生讲授汉语,向东方学生讲解英文^{[11]14},在中国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之前,这里成了英国来华传教士的汉语培训基地,1843年搬迁到香港后,继续发挥培训传教士汉语的作用,英华书院的汉语教学模式沿用传统的语法翻译法,以《四书》为教材进行翻译练习。中国国门被打开以后,西方基督教学派在中国境内建立的很多中文教会学校也成了汉语对欧传播的基地之一。

四、近代欧洲的汉语教材

儒家经典从16世纪起就成为欧洲人学习汉语的教材。首批来华传教士于明朝来华,明清两朝《四书》是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在文人士大夫心目中地位极高,是当时读书人的必读之书,来华传教士意识到熟读《四书》有助于他们与文人士大夫交友,有助于他们了解中国人的思想根源,进而有助于传教活动的展开,因此,首批赴华传教士主要以《四书》为教材学习汉语,把以《四书》为代表的汉语书面语的学习视为在华立足的必要功课。利玛窦是最早利用《四书》学习汉语的欧洲人,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进入中国内陆传教,1589年,他在韶州一边宣教,一边以“四书”为教材自修汉语,一边着手翻译《四书》,一边给石方西和郭居静两位神父讲授《四书》,他们积极研修《四书》,通过《四书》认知汉字,学习汉语的书面表达,体悟汉文化^{[7]152}。1594年,利玛窦首次完成了《四书》的拉丁语翻译,后来的来华传教士以此为汉语学习教材并不断修改完善。利玛窦利用《四书》为教材学习汉语的方法一直在来华传教士中间传承,郭纳爵给殷铎泽、恩里格、鲁日满、柏应理讲解《四书》,让他们翻译《四书》来巩固学习。1662年,郭纳爵与殷铎泽合作翻译了《大学》的中拉双语对照本 *Sapientia Sinica* (《中国智慧》) 作为西人学习汉语的教材,该译本将汉字作为形音义的统一体来展示,是欧洲人系统地认知汉字及汉语词汇的肇始^{[7]153}。1667年,殷铎泽的《中庸》中拉双语对照本译著 *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中国政治伦理知识》) 沿袭了《中国智慧》的翻译传统,也旨在作为汉语教材使用。18世纪,中国儒家经典成为欧洲汉学机构和汉语课程的教学内容。法兰西学院的前身巴黎皇家学院(Collage du Roi)的东方学教授倾心于中国的语言文化,18世纪20年代,阿拉伯语教授傅尔蒙在他的课程中尝试加入了汉语和《大学》的讲解。1730年,普鲁士早期汉学家贝耶出版了《汉学博览》两册,被称作是欧洲研究汉语的第一部著作,但是,由于内容荒诞不经,没有得到法国汉学界和西方东方学家的认可^{[12]78}。欧洲学院式汉学确立后,《四书》被定为海内外汉语教育与汉语研究的必读书目。1815年,法兰西学院正式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将《大学》列入授课内

容,这是中国语言文学首次进入西方大学殿堂。雷慕沙第一个在大学里开设了汉语课,他的继任者儒莲在法兰西学院教学中,在课堂上为学生们讲解《四书》等经典的原文,归纳出汉语的结构规则。他不单独讲授汉语语法,这样做给予学生更多思考与体认的机会。牛津大学是英国汉学发展的重镇,1875年设立汉语学科,目的是对华商贸以及为大英帝国的对外扩张服务,1876年起,理雅各担任第一任汉语教授,为了培养学生的中文能力和篇章表达能力,理雅各以中国儒家、道家等中国经典为教材,开设了大量汉语语言和中国文化课程,作了36场汉语语言和中国文化讲座,教学模式语文并重,文化部分通常讲解评述孔孟、二程和朱熹,理雅各教授汉语的最终动机与传教有关,他一直不断推动着以《四书》为首的中国经典在英国的传播^{[11]117}。对于牛津大学的汉语教育目标,他表示“在牛津,一个学子可以把汉语学到用书面语让中国人看明白的程度。但能否学到很高的程度,能否用典雅的汉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或就任何问题写出让中国学者满意的论文,能否不借助中国学者的修订就写出漂亮的文章,这就很难说了。但我也不是说这就是不可能的……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一定时间的苦练,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能做到。”^{[13]263}遗憾的是,总体来说,他的学生人数寥寥无几,基本为英国人,也有个别日本学生,他教学时强调应当利用儒经推动中国基督教事业,鼓励年轻新教教士了解孔孟学说。

欧洲的汉语教学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汉语教材的编写和中外词典的编纂上。法国汉学家马若瑟编纂了《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又译《中国语言志略》),是旨在帮助欧洲人轻松学习汉语的速成教材。他认为,通过学习此教材,欧洲人“只需三到四年的时间就能学会说汉语,读中文书,用汉语口语和书面语进行写作”。《汉语札记》包括四部分:绪论和第一、第二、第三编,绪论介绍了中国的典籍和汉字,并按照中文发音元音的序列列出1445个常用字简表。第一编阐述官话及其语法特征;第二编阐述文言及其语法特征;第三编已佚^{[7]154}。教材用拉丁语写成,马若瑟结合自己汉语学习经验,反对强调概念和语法规则,主张摆脱母语束缚,通过反复模仿操练,达到通晓中文的目标,该书对汉语口语和常用文体进行了细致的说明,并辅以很多书面语例证。雷慕沙编写了汉语语法课本《汉语语法基础》(*Ele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1822年),又翻译《汉文启蒙》,具有开创性。巴赞编写了《官话语法》;儒莲编写了《新编汉语句法结构》,他还在《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上发表了《汉语四字考论》(*Examination of Four Chinese Characters*)^{[7]156};哥士耆编写了《汉语口笔语渐进大全讲义》;微席叶编写了《汉语(北方官话)入门》;于雅尔编写了《法国人实用口语手册》(1885年)。

英国的马士曼、马礼逊、萨默斯、威妥玛、翟理思等人也编写了卓有影响的汉语教材,教材内容涉及语法、汉字、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方言、汉语口语、语音等。为了帮助西方人学习汉语语法,马士曼编著了《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以《四书》为语料,以中国文言语法为核心,引用大量中文例句,曾被伦敦皇家学院选作汉学专业的教材^{[7]156}。1815年马礼逊编写出版了英文版的《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和《中文英译》(*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通用汉言之法》是马礼逊关于中国语言学的第一部作品,编写此书的目的是给学习中文的学生提供切合实际的帮助,全书共280页,依次是:关于中文独特性的评论;中文拼音表、汉语词汇的欧洲拼字法、音节表、声调、声调练习表、汉字的书写方法、汉字的结构、部首表、中文字典、标点法、词性列表、地方土话、诗学;中国的诗歌及韵律、五言诗和七言诗的规则、中国诗歌的发展史、《诗经》的内容以及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除了诗歌外,中国还有赋、曲、辞、词等。1817年,马礼逊编写了《中国大观》(*A View of China*),包括年表、地理、政府、节令、节日和宗教神学等部分,编写此书的目的是为学习中文的学生提供便利,于1817年由东印度公司资助在澳门的东印度公司出版社出版。马礼逊认为,在广州、澳门乃至南洋进行传教和商业活动,必须学会广东省土话,为此目的,1828年,他编写出版了《广东省土话字汇》(*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是广东方言字汇,全书分为三部分:(1)英汉字汇,(2)汉英字汇,(3)成语词组^{[14]419}。萨默斯编写了《中国语言和文学讲义》(*Lecture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1853年)、《汉语手册》(*A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63年)、《中文基础》(*The rudimen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dialogues, exercises, and a vocabulary*,1864年)。外交官出身的威妥玛在剑桥大学教授汉语,编著了数种汉语入门读物,例如,《语言自述集》,编于清末民初,是以北京官话为基础的汉语口语教材,不但为当时的英国外交官学习汉语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卢慈章的《北京切音教科书》、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以及赵元任的《新国语留声片课本》等国内汉语教材的编撰及相关拼音方案提供了借鉴。威妥玛的汉语教材《寻津录》(1859年)和《语言自尔集》(1867年)出版后,大受欢迎,书中的“威妥玛北京注音方案的通用性和领先地位得到了确立。翟理思也是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他从1872年

到1919年先后出版了多部汉字和汉语口语教材,如《汉言无师自明》《字字举隅》《汕头方言手册》《百个最好的汉字》和《百个最好的汉字(二)》,这些教材用简单的音译和释义方式给相应的汉字、同义词、方言和句子注音或译释,简单易学,方便实用,在早期驻华使馆的翻译学生和其他英国汉语学习者中是畅销书,翟理思和威妥玛的汉语拼音注音方法结合在一起后,成为西方国家通用的威妥玛—翟理思注音系统。另外,翟理思还编撰了《语学举隅:官话习语口语辞典》(1873年),汇集了许多结构特殊的中国习语,对于汉语独特的语言结构和汉文化的体悟有深刻的启示;他的《关于远东问题的参照词汇表》(1878年)收集了日常生活和报刊杂志中流行的术语、书目、俚语和短语,带简释,对其历史和词源加以说明,为学习者认识远东问题提供了便利^{[15]26}。

德国为汉语对欧传播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7世纪德国人对汉语秘密的探寻,即寻找“中文之钥”是欧洲了解中国信息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显示了关于中国的概念是如何渗透进欧洲凝滞的思想氛围的,缪勒宣称掌握了“中文之钥”,但是因为他出高价兜售这一成果未果后将之摧毁,门采尔继缪勒之后继续探寻“中文之钥,遗憾的是没有成功^{[16]206-213}。在编写汉语教材方面,德国小嘎伯冷兹和函尼士值得一提。小嘎伯冷兹在1881年编写出版了《中文语法(不包括俗体和今天的口语)》(*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是出现在《马氏文通》之前的全世界最早用现代西方语言和语言学理论写成的中文语法书^{[8]136}。函尼士编著的古汉语教材《汉语教程》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德国的标准教科书。此外,恩德利希编写了《汉语语法基础知识》(*Anfangsgründe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 1845年);阿伦特编写了《中国北方口语手册》和《中国北方口语入门》;佛尔克编著了《新汉语书面语手册》;莱辛和奥特默尔合编了《北方汉语口语手册》;特里特尔和佩尔尼茨合编的《现代中国小说教材》,这些教材为德国人学习汉语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五、近代欧洲的汉语字词典编纂

欧洲人为了便利地学习汉语,编写了多部汉语学习工具书。利玛窦和罗明坚耗时5年(1583—1588年),合编了第一部葡汉双语词典《葡汉辞典》,又名《平常问答词意》^{[10]4},利玛窦和郭居静合编了《西文拼音华语字典》,是中国汉字拉丁化道路之始,为早期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提供了方便。荷兰的休尔纽斯在1628年前后,编写了第一本荷拉中三语汉语词典,词典正文页先列出荷兰文和拉丁文词语,在旁边标上汉字及其用法。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叶宗贤约在1733年编纂了中拉字典《汉字西译》;法国耶稣会士汤执中编纂了《法汉字典》、白晋编纂了《中法字典》、孙璋编纂了《汉蒙法对照字典》,顾赛芬编写了《汉语古文字典》(1890年)。戴遂良主要研究语言学,1895年开始编写《汉语古文字典》一书,收录1925年以前的词语,包括4部小词典:(1)《词源》(根据《说文解字》编写),(2)《谐声》,(3)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汉字注音字典,(4)词典,该字典是西方汉语音韵史上的第一书。德国耶稣会士魏继晋编纂了《德华字典》等。英国马礼逊1808—1823年间编纂出版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又译《中国语文字典》),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卷帙浩繁的英汉、汉英字典巨著,成为中国英汉、汉英字典的嚆矢^{[11]116},这部字典编写的初衷是为来华传教士来华活动提供便利。1815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一卷《字典》,是按照嘉庆十二年刊刻的《艺文备览》英译的,汉英对照,按汉字笔画分成214个部首排列,书后附有字母索引;第二卷的上卷《五车韵府》1819年出版,根据音标按英文字母编排,1820年第二卷的下卷出版,附录中将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古文六大汉字书写类别列出;第三卷《英汉字典》1822年出版,内容包括单字、词汇、成语和句型的英、汉对照,解释颇为详尽,例句都有汉译。整部字典共有六大本,合计4595页,《华英字典》出版后,在“欧洲大陆流传极广”,基本上学习汉语的人士人手一本^{[7]157},《华英字典》对汉语从文言到现代白话的过渡具有导向作用,字典包含了不少现代汉语语汇,提出的拼音方案为后来的威妥玛拼音方案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这部三卷厚重的《汉英字典》(1892/1912年),倾注了翟理思20年的时间编撰出版、20年的时间修订再版,其学术价值和《华英字典》旗鼓相当,字典收录汉字13838个,单字都有编号,采用释义法给出多项英文释义;在注音方面采用威妥玛—翟理思注音系统排序,将标准音与多种方言的注音结合起来;其主要内容包括字、词、书面语、口语、俚语、俗语、谚语、惯用语、专名、典故等;在翻译方面采用厚重译法,即对于词源、文化典故等解释详尽;附表包括官职等级标志表、姓氏表、中国朝代表、地理表、历法表和杂表。这些词典的编纂体现了这样的趋势:从马礼逊到翟理斯,在单字条目下所收字条目数呈

增加趋势,特别是翟理斯词典的条目明显增多,这说明在词典编纂方面,越来越注重使用性和实用性^{[4]150}。

六、结 论

欧洲汉学的发展与汉语在近代对欧传播一直息息相关,如影随形,汉语西传的阵地在不同时代场所不同,从早期的传教士时代的作品中的零星传播,到欧洲高校和欧洲正规的汉学研究机构,再到亚洲地区的教会中文学校以及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中文学校,到现在的欧洲大学、中文培训学校以及孔子学院,汉语传播的范围和规模越来越大,汉学的研究和发展为汉语的西传注入了持久的生命力;反过来,汉语教学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欧洲汉学的进一步发展,二者的关系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一定会愈加密切。

[参 考 文 献]

- [1] 阎纯德.汉学的演进与中外文化之约[M]//汉学研究·秋冬卷.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
- [2] 胡明扬.国学、汉学、中国学[J].南开语言学刊,2009(2):143-147.
- [3] 管永前.对国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9(1):33-36.
- [4] 赵长江.十九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4.
- [5] 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6]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书札[M].芸琪,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 [7] 陈树千.《四书》西行与汉语早期对欧传播[J].孔子研究,2016(1):151-158.
- [8] 叶翰.德国汉学与慕尼黑的研究传统[J].文化遗产,2014(6):135-142+158.
- [9] 王庆存.欧洲汉学家感知中国的桥梁[J].对外大传播,2006.2:28-31.
- [10] 上海博物馆.利玛窦旅行中国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11] 陈树千.十九世纪“四书”在欧洲的传播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5.
- [12] 王海龙.西方汉学的前世与今生[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76-84.
- [13] 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3.
- [14]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15] 杨柳.剑桥汉学与翻译传统:十九世纪至当代图景[J].中国翻译,2014(4):26-31+128.
- [16] 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M].陈怡,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卢春艳】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in Modern Europe

YU Pei-wen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in modern Europe is closely related to European sinology development. The paper, firstly, makes a sketch of European sinology development; then, discusses respectively European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s employed in Europe and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areas, Chinese textbooks used by European language learners, and the compiling of Chinese textbooks and Chinese dictionaries; lastly, points out that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modern Europe is in close connection with European sinology development, and the areas of Chinese language dissemination diversify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have a tendency of wide spreading. In the future,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language is likely to be in closer and closer connection with European Chinese Studies.

Key words: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in Europe; European sinology;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s; Chinese textbooks & Chinese dictionaries